

黄朴民  
解  
读

# 三略·六韬

HUANGPUMIN JIEDU  
SANLUE LIUTAO

岳麓书社

1478970

黄朴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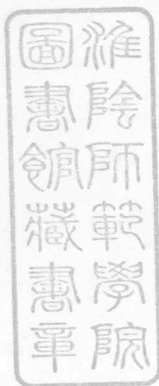
解  
读

# 三略·六韬

HUANGPUMIN JIEDU

SANLUE LIUTAO

黄朴民 撰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478970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朴民解读三略·六韬/黄朴民撰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

2010

ISBN 978-7-80761-526-2

I. 黄... II. 黄... III. ①兵法②六韬—译文

③三略—译文 IV. E8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1743 号

黄朴民解读三略·六韬

撰 者:黄朴民

责任编辑:彭卫才

封面设计:吴颖辉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9.5

字数:220 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978-7-80761-526-2/K·290

定价:15.00 元

承印: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### 三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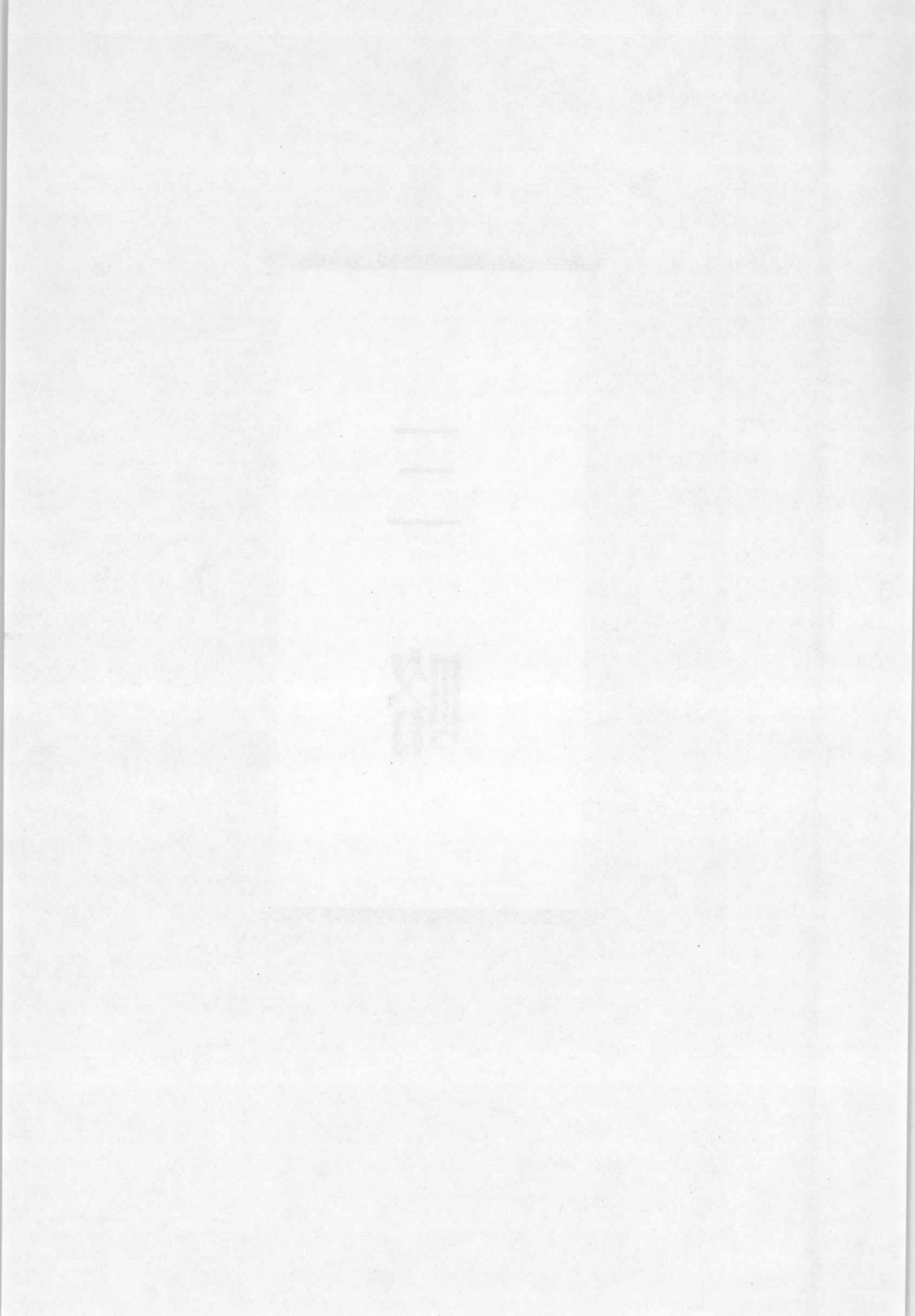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导言 .....       | 003 |
| 卷上 上略 .....    | 045 |
| 卷中 中略 .....    | 061 |
| 卷下 下略 .....    | 067 |
| 附录 黄石公素书 ..... | 075 |

### 六韬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导言 .....     | 093 |
| 卷第一 文韬 ..... | 109 |
| 卷第二 武韬 ..... | 147 |
| 卷第三 龙韬 ..... | 167 |
| 卷第四 虎韬 ..... | 211 |
| 卷第五 豹韬 ..... | 251 |
| 卷第六 犬韬 ..... | 273 |



三  
略



## 一、云笼雾罩：《三略》的来龙去脉

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又称《三略》，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，被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全书共分《上略》《中略》《下略》三卷，约三千八百余言。

关于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来历，也就是说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，历来都是一个谜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谓之云笼雾罩、龙潜豹隐实不为过。传世典籍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难以考实，乃是中国古籍流传中一个带共性的特点，《黄石公三略》的情况尤其如此。尽管这样，这个问题总归是绕不过去的，所以，今天我们要比较完整准确地向广大读者介绍《黄石公三略》一书，首先得从它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谈起。

### （一）《三略》是不是黄石公所著

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如果简单地顾名思义，其作者当为黄石公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持这样的看法，认为《三略》作者是下邳神人：“《黄石公三略》三卷，下邳神人撰。”而所谓的下邳神人，就是那位历史上名声显赫、曾授张良（子房）以兵书的黄石公。然而，问题并不像《隋书·经籍志》作者所理解和叙述的那么简单，黄石公

是否拥有《三略》一书的著作权当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！这只要我们细读一下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的有关记载便可以发现其中的疑窦了。

《留侯世家》叙录的关于黄石公传授张良兵书的基本经过大致如下：秦王朝末年，政治暴虐，民怨沸腾，社会大动乱正在迅速酝酿之中。当时，出身于韩国贵族的张良，为了报亡国毁家之仇，不惜重金收买了一名刺客，企图在博浪沙击杀巡行途中的秦始皇，殊不料功亏一篑，刺客的大铁槌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，暗杀行动以失败告终，这就是宋末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所颂诵的“在秦张良椎”历史事件。张良行刺未遂，为朝廷所通缉，被迫隐姓埋名，流亡于下邳（今江苏邳州市）一带。

有一天，百无聊赖之中的张良信步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。这时，迎面走来了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人。这老人到了张良跟前，一抬脚将自己的鞋子甩到桥底下，然后极不礼貌地对张良说：“小子，下去给我把鞋子捡上来！”张良愕然地看着老人，心里想这位老人也太不懂事理了，本不愿理睬他，可看到老人确实已经上了年纪，与他不宜作计较，于是强忍着火气，下桥帮老人将鞋子给捡了上来，老人不但不道谢，反而得寸进尺，把脚一伸，又冲着张良说：“给我把鞋穿上！”张良闻言真是感到又可气，又可笑：从哪儿冒出个神经兮兮的老头子。心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，那就好事做到底，干脆再替他穿上得了，于是又跪下身子给老人穿上了鞋子。老人一句话未说，扬长而去。张良很吃惊，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老人远去。没过一会儿，老人又返了回来，对张良说：“小子，看来你还是可以教育培养的！五天之后天亮时分，仍然到这个地方来见我。”张良意识到这位老人并非寻常人物，便跪下恭敬地回答道：“是。”

五天后天亮时，张良如约来到桥上，但老人已经先到那里了。他一见张良，便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约好了与我老头子见面，却迟到了，这像话吗？”说完扭头便走，并扔下一句话：“五天后早点来！”



五天之后，鸡刚报晓，张良就提前赶到了桥上，岂不料又是老人先期抵达。老人恼怒地说：“你又落在我后面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五天后再早点来。”又过了五天，这次张良学乖了，还未到半夜，便来到了桥头等候老人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也来了。他见张良比自己先到，高兴地说：“这一回你小子做对了！”于是从衣袖中拿出一部书，递交给张良，说道：“读了这部书，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。再过十年，你一定会功成名就。十三年后，你我将在济北见面，谷城山下的黄石，那就是我。”说完老人便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在世上出现过。

天亮之后，张良返回潜居之所，打开那部书一看，原来是一部兵书，名叫《太公兵法》。张良很珍视这部兵学奇书，时常诵读体会，韬略水平日见提高，后来果真辅佐刘邦推翻秦朝，翦灭项羽，成就了一代帝业。十三年后，张良跟随刘邦途经济北，果然在谷城山下找到了黄石，于是将黄石郑重取回，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。去世前夕，又遗命家人一定要把黄石与自己一起下葬。其家人依言而行，每逢祭祀时，连同黄石也一起祭祀。后来，人们就把那位不知姓名、来历蹊跷的授书老人，尊称为黄石公。

根据《史记》的这段记载，我们知道，张良从黄石公处得到的兵书，当为《太公兵法》，而不是《三略》。《太公兵法》，即是托名西周开国功臣姜太公撰著的兵法。由于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韬略而著名的军事家，因此后人普遍热衷于将自己撰写的兵书假托姜太公之名，以行于世，“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于是自先秦至秦汉，乃至隋唐，社会上流传着为数不少、名目各异但同属《太公兵法》范围的兵学著作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“儒家类”与“道家类”分别著录的《周史六弢》六篇、《太公》二百七十三篇，《李卫公问对》所提及的“《太公·谋》八十一篇”“《太公·言》七十一篇”“《太公·兵》八十五篇”等。另外还包括了流传至今，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的

《六韬》。甚至于古代王者《司马法》，按《李卫公问对》作者的观点，也属于《太公兵法》系列的兵学著作，“周《司马法》，本太公者也。”

所以，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《三略》是否同属于《太公兵法》系列的兵书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则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《三略》，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称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《太公兵法》，其实质是一样的，两说之间并无根本的矛盾，仅仅是一为专称，一为泛指。反之，则两者之间显然互相牴牾，矛盾丛生，黄石公实非《三略》的作者。

按照《李卫公问对》作者的观点，《三略》如同《六韬》一样，同属于《太公兵法》系列的兵书：“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《三略》是也。”宋代施子美在其《三略讲义》中进一步作出说明：“《六韬》《三略》，本《太公兵法》，而谓之《黄石公三略》者，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，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，而其所授之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，后世因而谓之《黄石公三略》，亦如《诗》本夫子所删也，后世谓之《毛诗》，以其出于毛茛之所训也。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其此意欤？”

将《三略》视为是《太公兵法》系列的一种兵书，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解决《史记》与《隋书》记载上的歧异。然而，若进一步考虑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，即为何同为黄石公所授之《太公兵法》，《三略》被后人冠上了《黄石公三略》之称，而《六韬》却没有人称其为《黄石公六韬》呢？

施子美对此作了回避，明代刘寅觉得这个问题绕不过去，于是在其《三略直解》中提出了自己的假设：《三略》属于《太公兵法》系列，但《三略》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，故被后人冠以《黄石公三略》的名称。刘寅的具体分析是：“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，并不言有《三略》；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，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

技巧四种，共五十三家，而《三略》亦不载焉。史称张良少匿下邳，与父老遇于圯桥，出书一编，曰：‘读此书则为王者师。’遂去，旦日视之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《通鉴纲目》亦曰：张良与沛公遇于留，良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公善用之，常用其策。与他人言，辄不省。良曰：‘沛公殆天授。’遂不去。《正义》云《太公兵法》一帙三卷。唐李靖亦云：张良所学，太公《六韬》《三略》是也。然则《三略》本太公书，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，所以兵家者流，至今因以为黄石公书也。”

刘寅这个假设从表面上看，是可以自圆其说的。故获得不少学者的首肯，如张居正就接受了这一观点，并进一步认为，黄石公所推演的，主要是《下略》：“《三略》，本太公书，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……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。《上略》所引皆曰《军谶》，《中略》皆曰《军势》，《下略》独无所引，而自言也。”清代朱墉在《三略汇解》中的见解，大致上也与张居正的上述看法相一致。

然而，遗憾的是这个判断并没有得到有力史料的佐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比较可信地判定《三略》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，最根本的途径，乃是具体分析《三略》本身的内容，把握其文字内容、思想意蕴所反映的时代特征。

对《三略》本身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后，我们可以发现，《三略》不可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。第一，《三略》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，它着重关注和探讨的是“安天下”“治天下”的原则和方法，它更多地体现的是治军、驭将的目的与手段，而不再把重点置于作战指导原则的阐发，这都表明它是国家统一背景下的军事理论总结，而不是战乱或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兵学思想建树。总之，它是政兵书而非纯兵书。第二，基于大一统兵学的根本属性，《三略》的许多具体原则都表现出安邦治国的价值取向。如强调“释远谋近”以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，又如将“夺其威，废其权”作为君主处理与将帅关系的基本准则，也与孙子与《六韬》所提倡的“君命有

所不受”观点迥异其趣等。第三,《三略》虽然突出体现了大一统兵学的特点。但这种大一统是汉以后内圣外王、“霸王道杂用之”式的大一统,而并非专尚武力、以法家为唯一指导思想的秦王朝式大一统。第四,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看,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也略晚于战国末年成书的《六韬》一书。《六韬》在战国后期即有记载,当时的庄周曾见过《金版六弢》,西汉的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则明确提到《豹韬》,高诱注说:“《金滕》《豹韬》,周公、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。”而《三略》见于著录的时间则要晚得多,其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陈琳所作的《武军赋》,而其有案可稽的文字内容引用,最早也是在东汉初年(详见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)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《三略》成书晚于秦汉之前,黄石公本人似不是《三略》的作者。

其实,《三略》成书于秦汉之后,历史上早已有人指出。如明代的王守仁(阳明)在其手批《武经七书》中,即论定《三略》不是秦汉以前之书,当为后人伪托:“旧题黄石公撰,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。文义不古,非秦汉以前书,疑为后人伪托。”清代水璐总纂的《四库全书总目·黄石公三略提要》也持同样的观点。当代学者持相似的看法更为普遍。许保林《黄石公三略浅说》、张文才《中国兵书十大名典·黄石公三略·前言》、宫玉振《白话三略·前言》,对这个问题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,不约而同认定《三略》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前,黄石公并非《三略》的作者,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不妨一读,以作参考。

## (二)《三略》究竟成书于什么时候

《黄石公三略》作者究竟是谁?它究竟成书于何时?关于第一个问题,既然已基本排除了黄石公撰著的可能性,那么在缺乏足够充分材料来考定具体作者的情况下,大可阙而不论。众所周知,秦汉以降,人们依托前代名人撰文作著的现象十分普遍,例如战国时期流行的黄帝之书,魏晋时期伪托列子所著的《列子》等,都反映了

这样的风气，它使得其真正作者的姓名反而湮没无闻。《黄石公三略》作者的情况当与此类同，所以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功夫。比较适宜的做法，是将《黄石公三略》的作者视为深富韬略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逸高士。

但是，关于《三略》成书年代，我们似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定，因为这对于我们从军事文化发展长河考察《三略》的特色和价值，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兵学嬗递之轨迹与一般规律实有裨益，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《三略》的兵学地位。从这层意义上说，我们在这里还要费些笔墨，谈谈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问题。

学术界在《三略》成书年代问题上的最普遍观点，是认为其书大致成书于西汉末年。但也有少数学者论证其成书于东汉时期。虽说两说在时间界定上稍有先后，但是并无太大的分歧。因为，一是都将《三略》视为两汉时期的作品，时差至多不过两百年左右，这在古书年代学上并非什么严重问题。因为就古书成书一般规律而言，古书通常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，而往往有一个从雏形到定稿乃至流传的较长过程（参见余嘉锡《古书通例·案著录第一》）。这样，无论将《三略》看成是西汉的作品抑或东汉的著述，均无大碍。二是就《三略》本身内容泛泛来看，不论是将其认定为西汉之作，还是将其认定为东汉之作，都有各自的道理，都能说得通。

当然，若有办法能更明晰地确定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，自是佳事。笔者的基本观点，是认为《三略》当为东汉后期的兵学著作。以下略述主要理由：

一般而言，考定古书成书的确切年代，必须关照的重要因素不外乎：历代典籍的著录以及文字引用；其书本身的主体思想倾向、主要内容以及文字风格、著作体例等。而就这些方面来看，我们认为，将《三略》的成书年代确定在东汉晚期更为合理。

首先，从文献著录所透露的信息看，《黄石公三略》成书当在汉末年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序》云：“汉兴，张良、韩信序次



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”然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并没有著录《黄石公三略》。这说明迄至东汉中期班固时，其书尚未定型与面世。

现存史料表明，《三略》之名最早见于汉魏之际。东汉末年文学家、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其《武军赋》中始有“《三略》《六韬》之术”的说法（原文见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九《全后汉文》）；三国魏明帝阁阳侯李康《运命论》复称：“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《三略》之说，以游于群雄”（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四十三《全三国文》）。这说明《三略》是在东汉末年才开始流传于世的，它的成书当基本与此同步。

至于其书全称《黄石公三略》则要更晚一些，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所著的《魏书·刘昫传》，其称北魏著名学者刘昫曾“注《周易》《韩子》《人物志》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并行于世。”此处有个细微之处值得引起注意，即魏收对刘昫所注四部书的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按时代顺序列举的，刘劭《人物志》亦成书于汉魏之际，故与《黄石公三略》相属，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《三略》真正成书当在东汉末年。而其为“正史”所正式著录则始于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等人所撰的《隋书·经籍志三》，其后，历代正史“艺文志”“经籍志”及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。由此可见，从文献著录角度考察，《三略》成书于东汉末年。

当然，古籍成书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，考定《三略》成书于东汉末年，并不意味着其书雏形在东汉初年不曾存在，这方面比较有力的证据是范晔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中的一段记载：建武二十七年，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，请求朝廷发兵出击匈奴。光武帝刘秀对此进行了批复，其中引录了《黄石公记》之文作为重要依据：“诏报曰：《黄石公记》曰：‘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柔者，德也；刚者，贼也。弱者仁之助也，强者怨之归也。故曰：有德之君，以所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所乐乐身。乐人者其乐长，乐身者

不久而亡，舍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舍远谋近者，逸而有终。逸政多忠臣，劳政多乱人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。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’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百姓惊惶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？”

光武帝“诏报”中称引的这段《黄石公记》文字，多近于今本《黄石公三略》（《上略》与《下略》皆有类似的内容，只是在具体文字上略有出入）。但是，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点，我们与“西汉说”者见解不同。我们不赞同《黄石公记》与《黄石公三略》是同一部书的不同名字的说法，而认为这恰好表明《三略》从酝酿到最终成书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《黄石公记》充其量为《三略》之雏形，而决非《三略》本身，这是合符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的。总之，《后汉书·臧宫传》虽引录了《黄石公记》文字，但这并不能作为《三略》成书于西汉的充足证据。

其次，也是更为重要的，是《三略》本身内容反映出它的成书年代只能是在东汉末年。这种“内证”较之于文献著录等“外证”“旁证”往往显得更有说服力。

很显然，阅读《三略》并考证其成书年代，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一是要充分考虑《三略》兵学体系中的黄老思想主导特征；二是要高度重视《三略·中略》所作的提示：“是故《三略》为衰世作”。而完全符合“黄老”思潮盛行与“衰世”这两个基本条件的，综观整个两汉时期，只有东汉末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。

考察《三略》全书，其内容杂采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信，法家的权、术、势，墨家的“尚贤”“尚同”，道家的贵柔守雌，阴阳家的“贵因”观甚至谶纬等诸家学说，而以“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”为特点的黄老思想为全书立论的基础，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，“从哲学属性上来说，《三略》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。”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在以下章节

中将进行具体分析阐述，兹不展开论说。

《三略》既然以黄老思想为主导，那么它的问世，必然应是在黄老思想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的特定历史阶段。而在两汉时期，这种情况只出现于西汉初年和汉魏之际。西汉初年，汉文帝、汉景帝以及窦太后等最高统治者，均尊奉黄老之学，所谓“孝文帝本好刑（形）名之言，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。在统治者的提倡下，当时崇尚黄老之学的士人与处士亦不在少数。文帝时有一位王生，其“善为黄老言，处士也”（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）。有长安卜者司马季主，“通《易经》，术黄帝、老子，博闻远见”（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）。景帝时有个黄生，也是位黄老学者。另外还有位田叔，也曾“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”（《史记·田叔列传》）。社会上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热衷与倾慕，势必要在学术领域中得到体现，故陆贾强调“夫道莫大于无为”（《新语·无为》）；贾谊认为“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域。”“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；千变万化兮，未始有极”（《鹏鸟赋》）；司马谈盛赞黄老之学“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立俗施事，无所不宜。指约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”（《论六家要旨》）。而在典籍方面，则出现了以黄老思想为主体内容的不少著述，如著名的《淮南子》。这种现象，一直要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遂基本得以改观，黄老之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，让位于儒学，转化为思想界的潜流。

不过，《黄石公三略》显然不可能产生于西汉初年，因为当时虽说是大乱之后，百废待兴，但毕竟不是“王泽竭”的“衰世”，与《三略》所称的“政不正则道不通，道不通则邪臣胜，邪臣胜则主威伤”（《下略》）景况风马牛不相及。

所以其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假设基本上可以被排除。

但是，倘若以东汉末年的状况来观照《三略》成书，则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，成书年代能够基本确定。这一是当时完全符合

“衰世”的时代特征。这表现为皇权衰落，吏治腐败，政治黑暗，外戚与宦竖交替擅权，豪强横行，边患迭至，儒林异化，大一统政治格局面临严重危机。以至有识之士对政局深感绝望，愤然浩叹：“嗟乎！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，将何用也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，欲何至邪。”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）这样的世道，的确确实属于《三略》所指称的“衰世”。也是与其书所述的“夫命失则令不行，令不行则政不正”的情况相一致的。

二是东汉末年黄老思想从儒学阴影中走出来，在思想界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。儒学自西汉中叶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，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，至东汉后期，已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，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，使自己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呈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诞怪异特征，严重窒息了儒学继续发展的活力和生机，在经学形式上，遭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；而在思想体系方面，又遇上部分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（王符、仲长统、崔寔等）的反思和批判。这一切均表明儒学在东汉末年已开始走上末路。而儒学的中衰，势必导致其他思想流派——如黄老之学、法家学说遂渐渐摆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压抑，再度活跃于当时的思想领域。换言之，当时诸子百家之学（尤其是黄老之学）重新风靡于世乃是不争的事实。如著名学者蔡邕在《释海》中津津乐道于：“心恬澹于守高，意无为于持盈，粲乎煌煌，莫非华荣；明哲泊焉，不失所宁”（《后汉书·蔡邕列传》）；又如仲长统亦汲汲追慕出世的欢乐：“安神闺房，思老氏之玄虚；呼吸精和，求至人之仿佛……逍遥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间，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期。如是，则可以陵霄汉，出宇宙之外矣。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！”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）

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大氛围之下，《三略》的作者才会把思想旨趣归结于“尚柔”“守微”之上，“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。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”（《上略》）。由此可见，《三略》主导思想之确立乃